

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被遮蔽的原因

吴建永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 对于国家的研究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走上学术舞台的起点,而且这一研究旨趣始终贯穿于二人的生命历程。然而长期以来,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却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和忽视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4个方面:理论建构缺失,缺乏系统的、独立的政治学著作;部分学者囿于“经济决定论”,缺乏对于上层建筑的系统性研究;过分解读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忽视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必经阶段“政治解放”;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实践和“权威解读”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教条化和妖魔化。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国家理论; 跨越式批判; 人的解放; 经济决定论

[中图分类号] A81;B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7)01-0052-06

犹太裔美国学者阿伦特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能与之匹敌的给予人的思维以影响的哲学只有黑格尔哲学。”^{[1]206}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历史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著作中曾经不止一次地给予崇高的评价。黑格尔在本质上赋予辩证法一种否定性和批判性的精神,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而至于辩证法本身,则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然而,到了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否定的、批判的、无所不能的辩证法,一旦遇到国家—这个地上的神物,便立刻抛弃了自己的革命面孔,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之中。黑格尔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中或者历史上的存在物,而是一种完满的、独立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整体性的精神。它是完美无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存在,像散发着无限光辉的太阳一样照耀着人间。

与黑格尔执着于国家的理念不同,马克思更为关注的则是对于现实国家的研究。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国家的来源与归宿、本质与职能,对于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曾经有过大量的描述与分析,但是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系统性研究也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它或者被认为缺乏整体性与理论性而遭

到忽视,或者被当作极权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被肆意歪曲与妖魔化。更有甚者,意大利学者科莱蒂公开宣称,“除了对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所作的分析之外,马克思和列宁对卢梭的理论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2],甚至妄言“就政治方面来说,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上面没有多少可增添的了”^[3]。

因此,要想系统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首先必须要回答的就是“是否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这一问题。

一 国家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

列斐伏尔在《论国家》一书中指出:“如果有人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一种连贯的和完全的国家学说体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这种学说体系是不存在的。反之,如果有人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国家,我们也可以告诉他,国家问题是马克思经常关注的问题。在他的著作中,有关于国家的一系列论述和一种显然已经确定了的方向。”^[4]在列斐伏尔看来,评价马克思是否具有一种国家理论,我们不应该以一种包含着教条主义的方式,全盘肯定或者否定地回答“是”或者“不是”、“有”或者“没有”,而是应该站在更广阔的视阈下,从马克思全部哲学的理论旨趣与终极目的角度来作出回答。

首先,早在1858年2月,马克思在从伦敦写给

[收稿日期] 2016-11-22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的自主性与国家治理研究”资助(编号:TJZXWT16-021);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资助(编号:PXM2016_014203_000107)

[作者简介] 吴建永(1986-),男,河北衡水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拉萨尔的信中就明确表明了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旨趣与未来可能的方向。他说:“全部著作分为6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家贸易;(6)世界市场。”^[5]紧接着,在当年3月份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以及第二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再三确认了自己这一研究计划。虽然后来马克思未能如愿以偿地完成这一宏大的研究计划,但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家问题在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中无疑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在他看来,政治国家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本身的发展史,因此,再也没有比研究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发达、最多多样性的国家形态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了。

其次,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的身份正是一名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那个时候,对于黑格尔理性哲学的盲目信仰还深深占据着这颗年轻的心灵,而促成其从国家理念转向现实社会,并最终抛弃法和国家的理性主义幻想的直接因素就在于《莱茵报》时期面对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正是在对出版自由、新闻检查、林木盗窃、官僚政治等有关国家生活的现实问题的讨论过程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产生了怀疑。在他看来,所谓理性的、道德的国家为它的公民所颁布的法律,却不是以普遍利益为依据,而是以政府官僚的私人利益及其对国家的道德的看法为基础,是对它们的“龌龊良心的不自觉的叫喊”以及对“公众智慧和善良意志的肆意践踏”^[6]。从这里出发,一直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青年马克思的研究视野始终没有离开过国家领域。同时,正是在对国家问题持续不断的钻研过程中,马克思最终彻底解决了困扰他的“苦恼的疑问”,打通了一条通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开启了一段以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以经济基础来说明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程。

英国当代著名学者鲍勃·杰索普指出:“马克思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与《资本论》的见识和严密性相当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分析。他论国家的著述,由一系列片段的、不系统的哲学思考、当代历史分析、报刊文章、偶发事件的评论组成。”^[7]纵观马克思的全部著述,我们的确很难找到一本单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专门著作,即使马克思早年所作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也并不完全就是纯粹讨论国家问题的专著。与之相反,马克思对于国家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大多是特定历

史事件和特定环境的产物”,在马恩经典作家的著述中“对政治理论的探讨不仅多半是不系统的和片断的,而且往往是其他著作的一部分。”^[8]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对于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理论问题采取了完全缄默和极端敷衍的态度。事实上,我们从马克思有关国家问题与政治事件的诸多零散的和片段性的论述中,从一个段落、一个短语或者一个隐喻、一个暗示中,都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着的极为丰富的、包含着天才的闪光点的内容。在马克思与不同的政治理论流派或者个人所进行的论战以及对重大历史事件与突发情况所作的评论中,马克思向我们一次次展示了其国家理论的轮廓和迹象及其在国家问题上的真知灼见。在德法年鉴时期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向我们揭示了国家与宗教、无产阶级与政治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在《哲学的贫困》和《论住宅问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阐释了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总权力”的本质及其看似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假面。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为我们描述了国家与暴力、政治统治与社会统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批判性研究,提出了过渡时期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构想。在《1848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对革命力量与进程所作的阶级分析中,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等一系列重大原则。

二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被遮蔽的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很明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确实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不仅如此,这种国家理论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还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整个学术生涯里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并未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研究进展,不仅如此,国家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位置也在时刻经受着被人肆意弱化甚至歪曲的危险。

那么,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何在呢?

(一) 国家理论建构的缺失

密利本德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中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需要对马克思本人

和恩格斯的原著给予最优先的注意。这是最重要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的仅有的可能的基础。只有在这样做了以后,才有可能再拿起列宁、卢森堡、葛兰西和其他人的著作;只有这样才能试图建立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9]但是,当我们开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进行认真翻阅的时候,很难从中找到一个顺畅的、系统的和没有疑问的政治理论体系。相反,如果通过不求甚解的阅读方式或者通过一些断章取义式的、下指令一般的方式,我们倒是可以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但这种理论却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被歪曲的理论,其中不仅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理解,而且也是对于原著本身和马克思本人的极大的不尊重。无独有偶,国内学者在谈到如何建立一种系统化和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非常有难度的理论课题,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有丰富的政治学论述,对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有透彻的分析和研究,但是比较系统的、独立的政治学著作并不多。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的一个困难就是没有一本像《资本论》那样完整的著作,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说得较为完整和系统。”^[10]

与密利本德不同,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对于这一问题则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柄谷行人看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以上这些客观因素,而主要在于马克思的理论企图以及其所采取的独特“批判”的方式——“跨越性批判”。作为一种实践哲学,马克思从根本上拒斥像黑格尔那样的体系化的、宏大叙事般的思想体系,而是根据理论意图的不同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移”,并在这种移动过程中为我们带来“强烈的视差”。所谓的“跨越性批判”就是某种并非“安定的第三种立场”的、“跨越的或者位置的移动的”的批判。马克思从来不想将自己的思想体系化,这并非因为他没有时间,而是因为他拒绝这样做。正是这种站在各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之外来批判各种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权的方式,被恩格斯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忽视掉了。因此,柄谷行人指出:“重要的是针对观念论而强调历史的受动性、针对经验论而强调构成现实之概念的自律性力量,这样一种马克思的‘批判’方式。马克思基本上是一位新闻纪实性的批评家。如果缺乏这种立场的敏捷移动,不管拾出马克思怎样的思考——他的话语因语境而多有相反的含意——都是无济于事的。试图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一个原理(doctrine)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没有这种不断的移动和回

转,马克思的思想是不存在的。”^[11]

(二) 对于“经济基础”的过分解读

要想找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建构缺失的原因,还需要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政治概念以及政治生活在其整个思想构造中的地位。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活作为人类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方式是不能按照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要素进行武断地分割的。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之间是彼此关联,而非孤立存在的。而具体到政治,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要害,是一种“有着与生俱来的哲学特征的唯一活动。”政治的无所不包与政治的普遍性的存在使它失去了自己独特的特征,不便描述。

其次,造成马克思主义者忽视政治理论建构的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过分解读。马克思对于这一原理的表述散见于其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之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所作的序言。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宣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2]正是对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活动的过度重视,使人们很容易将政治活动理解为完全是“被决定的”和“有条件的”活动,甚至将其看作是完全派生的和从属性的活动。如果将这一观点发展到极致的话,就会变成“经济决定论”,从而使政治活动和政治领域失掉任何实质上的、自主性的存在意义。

但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真正意图来看,他们是强烈反对任何简单的宿命论和机械的、线性的决定论观点的。1890年,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对于将马克思主义简单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给予了强烈的批驳与反击。恩格斯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丰富多样的,包含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甚至是地域环境的各种差别在内。决定历史进程的往往是各种各样相互交错的力量共同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各种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就是相同的和均等的,总有一种力量占据着主要位置,并起着最终的决定性作用。肯定经济活动的重要影

响,并不必然就将其他的前提和要素排除在外,“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13]732}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各种因素或者说不同意志合力作用下的结果,任何单独意志都包含在这股合力之内,“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3]696}

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试图将人类史简化为经济史,也从不认为只有经济活动才是唯一真实的、本质性的决定因素。人类的社会生活包含着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地理环境等大量因素的相互作用,唯物史观确认经济状况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并对历史过程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这决不意味着现实的历史过程中,只有经济因素才是唯一的动因,是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唯一一把钥匙。

(三)“人的解放”所带来的错觉

在谈到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时,密利本德曾经说过:“跟马克思的其他思想一样,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他的有关国家的学说,多半是后人咀嚼解释后的结果,这些解释通常与马克思主义的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理论并不是说同马克思本人没有一点关系,而毋宁说它们在片面强调某些方面的同时却忽视了其他方面,或者说在将一些原本极其复杂的观点简单化的同时,忽视了其中原本蕴涵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线索。”^[14]

与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作的错误解读类似,马克思早年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于“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所作的区分,也造成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忽视政治解放与国家生活的错觉。马克思主张,单纯的宗教批判与神学批判并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甚至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解放。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政治解放标志着旧社会的解体,它不仅使国家抛弃了宗教形式的虚幻色彩,而且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但政治革命毕竟不是人的解放的最终形式,仍然是一种包含着内在矛盾的、有限的、局部的解放。政治革命抛弃了披在国家身上的神学外衣,但并未从根本上摧毁宗教产生的物质基础与世俗根源。不同于政治解放,真正的人的解放是迄今为止的一切异化现象的最终消解。人的解放的实现,不仅必须摧毁宗教

的幻想,而且必须首先摧毁私有财产和以私有财产占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必须摧毁政治国家——这一“人的异化条件的最富特征的组织。”因此,按照马克思的构想,人的解放的实现,不单单要在政治领域中进行,还要求对现有的不合理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秩序进行革命性变革,亦即建立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

虽然马克思将人的解放看作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与最终的社会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视政治解放,相反,它是值得欢迎的。马克思主张,人的解放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政治解放则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必须的必然环节,亦即,实现人的解放必须经历两步走战略——“政治解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的解放”^[15]。因此,马克思断言:“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16]马克思肯定了政治解放的进步意义,政治解放汇集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优秀成果,不仅是人的解放到来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而且是人的解放进程中一个不容跨越的“卡夫丁峡谷”。因此,对于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两个概念的区分,正是马克思政治理论的独特之处与深刻之处,而非后来研究者指责马克思只重视人的解放,而忽视现实的政治分析的依据。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后果

阿伦特指出,如果我们要对马克思进行思考或者写点什么,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如此,一旦我们在触及到马克思的政治国家理论时,这种困难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拒斥与否定,并不是因为放弃了他的思想或者方法,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过分地权威化了,甚至成了一种公式似的东西,一种不容怀疑的历史定律。因此,她指出:“与当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困难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更是颇具学术性的工作。”^[13]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错误解读必须与其在20世纪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其被当作一种政治武器来使用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作为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直以来,苏联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官方哲学,并视自身为其最正统的理论阐释者,然而,恰恰正是这些自命为“正统的”阐释者为我们留下的文本遮蔽了本真状态的马克思。

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诸多“正统”的解读中,斯大林主义无疑具有重要责任。

作为国际共运的重要代表,斯大林带领着列宁去世后的苏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不仅将一个贫困的农业国建设成为成功的工业国,而且在二战中为彻底消灭法西斯势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际共运中建立起巨大的声誉。在理论方面,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延续,斯大林哲学继承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传统,在与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系统化、大众化和普及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伴随而来的对斯大林的疯狂的个人崇拜中,人们盲目地人为拔高斯大林哲学的学术地位,并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读奉若神明,这样造成的结果使得一门科学的、批判的、革命的理论变成了一门绝对化、教条化,并且不容置疑的圣人之言。列宁眼中鲜活的、多样化的历史进程,变成了神圣化、唯一性的路线模式。哲学成了政治的婢女,政治上的党性取代了哲学的党性原则。

斯大林主义的特点主要在于其对必须遵循的“路线”下定义时的专断性和强制性,从而导致其以某种教条主义的方式来决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什么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例如,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就武断地将“辩证唯物主义”等同于马克思的哲学,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单看作“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推广和应用。这不仅是将一个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甚至可能不知道的概念强行硬扯到马克思身上,而且错误地将历史唯物主义单纯当作一种应用性和实证性的“科学”,从而降低甚至抹杀了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划时代的革命意义。因此,斯大林主义对于马克思哲学所谓权威性的解释和毋庸争辩的命题,不仅不是“能够保证马克思思想繁荣昌盛的正确见解”,甚至可以说是对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思想的错误的偏离与肢解,是对“马克思的本真哲学精神的最系统、最严重的遮蔽。”^[17]

除了在理论上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马克思的哲学外,斯大林主义还将马克思主义简单用来为其政治模式进行理论辩护。英国新左派理论家爱德华·汤普森在谈到理解斯大林主义时坦言,最有效的一种方式莫过于将其理解为“一种源于对现实之片面的、宗派性的认识的虚假意识方式”^[18]。作为虚假意识的斯大林主义最显著的特点主要有3个,即

反智主义、道德虚无主义,以及蔑视人民、否认个体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一方面,斯大林主义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统统收归中央所有,并将其限制在官僚政治机构之中,破坏党内民主,渲染个人崇拜与独裁,对人民群众采取家长式的暴君作风。另一方面,它极力渲染一种阶级道德,不但要求本国人民忘却自己,对组织和领袖绝对服从,而且将其作为标准模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强制推行。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苏联国内党内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长期得不到正视与纠正,而且也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反民主、反自由、拒斥个人权利甚至极权主义的假象。

三 结 论

不可否认,国家理论不仅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条重要线索,而且还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热点问题。然而遗憾的是,今天当我们提起这一理论之时,似乎除了国家的起源、消亡和“工具论”的国家角色以外,竟然毫无发展创新可言。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国家理论既是最核心的观点之一,但同时也是被模糊化、歪曲和掩盖的最严重的一部分。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卷帙浩繁的经典著作中我们不难梳理出有关国家角色的6种取径,它们分别是:(1)国家于经济生产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且是寄生的体制;(2)国家仅是反映出财产关系及其经济斗争结果的附带现象,或者上层建筑;(3)国家是维持社会凝聚力的要素;(4)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5)国家是一套制度集合体;(6)国家是一种对于阶级斗争有特殊影响的政治支配体系。此外,还有国家与人的解放、国家与宗教、东西方国家比较性研究、国家的自主性研究,等等。毫不夸张地讲,国家理论不仅凝结着马克思恩格斯一以贯之的研究旨趣,而且具有鲜明的、重要的理论特色。因此,如何正确理解与完整把握这一理论的边界、内涵与真谛,从而进一步发挥好、运用好这一理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大作用,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 [1] [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 [2] L. Colletti. Rousseau as Critic of “Civil Society” [M]. London: in Form Rousseau to Lenin, 1972: 185.
- [3] K. Marx. Early Writings [M]. London: Pelican Ed., 1975: 45.

- [4] [法]亨利·列斐伏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22.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0.
- [6] 孙伯燊.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90.
- [7] Bob Jessop. Recent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7(1):354.
- [8] [英]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
- [9] Ralph Miliband. Marxism and Polit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5.
- [10]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
- [11]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25.
-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 Ralph Miliband. 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Essays)[M]. London: Verso, 1983:3.
- [15] 黄建都.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继承和超越[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74-78.
-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
- [17] 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J].学术月刊,2012(5):33-46.
- [18] [英]爱德华·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M]//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5.

On the Reasons Why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 is Shielded

WU Jian-yong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state is not only the starting point of Marx and Engels on the academic stage, but also the purpose throughout the life course of two people.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Marx's theory of state did not get the attention they deserve, its systematic research has not made any substantial progress. The reasons why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 is shielded mainly lie in four aspects: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the systematic, independent political writings;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determinism", some scholars ignoring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superstructure; over-interpretation of the Marxist "human liberation" theory, ignoring the realization of "political liberatio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Soviet Union dogmatizing and demonizing the Marxist state theory in the political practice and the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marxism; state theory; leaping criticism; human liberation; economic determinism